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BEIJING SHIFAN DAXUE SHIXUE WENKU

急进与慢变

——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

孙燕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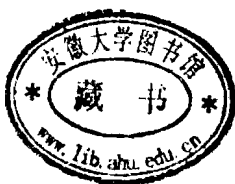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急进与慢变

——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

孙燕京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急进与慢变: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孙燕
京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397-4

I. ①急… II. ①孙… III. ①社会形态—研究—中
国—近代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5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ǎnqīng Yǐlái Shèhuì Biànhuà de Liǎngzhǒng Xíngtài

急 进 与 慢 变

——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

孙燕京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397-4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25.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问：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任：杨共乐

副主任：李 帆 易 宁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成等，又有一批崭露头角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大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

2 急进与慢变

史学的压轴之作”。其他教师的学术论著也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类学术奖项,得到学界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铸就自己的辉煌,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社会政通人和,学术研究也日新月异,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本系决定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系学者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整体学术水准。同时,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也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写在前面

本书所收论文相当一部分已公开发表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北京社会科学》、《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另有一些尚未付梓。论文涉及的时限多集中在晚清时期，少数溯前或推后。内容则主要包括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发生的变动。概括起来，我把革故鼎新、天地翻覆、急风暴雨式的变化，称之为“急进”；而那些潜移默化、和风细雨式的社会变迁，则视之为“慢变”。我以为，从较长时段来看，中国社会的演进方式更多表现为“慢变”。

全书大致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属于晚清政治，特别是甲午战争一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时期上层社会、士大夫阶层的种种情形；后一部分为社会生活、社会风尚的变化，它包括了清中晚期以后乃至民国时期社会风气、下层民众生活状态、民间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心理、价值观、价值取向、审美意趣等社会意识形态浅层次的嬗变。从分量上看，前一部分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既因为我个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慢变上，也与我晚清社会的演进方式总体认识相一致。

作为附录，收录了我与施彦同学、岳珑教授合作的两篇论文。收录的初衷是这些文章也属于“慢变”的形态，只是在时间段上不是前伸就是后延，放在其中，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的观察更加深入。

2 急进与慢变

由此,对她们的劳动表示深深的敬意。

论文写于不同时期,收入时基本保持旧貌(具体情况见后记)。
如因注释风格不同而给读者造成麻烦,还望海涵。

孙燕京

2007 年春于和平西苑袖手斋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急进篇

壹. 地方督抚与晚清政局·····	3
贰. 鸦片战争前后的诗·····	50
叁. 论甲午诗的思想特色·····	71

慢变篇

壹. 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	93
贰. 略论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	146
叁. 晚清知识层的风尚差异及士人的边缘化·····	166
肆. 漫论辛亥时期的服饰·····	197
伍. 双重困境中的李提摩太·····	213
陆. 论晚清民国时期东西部风尚差异趋重的成因·····	232

附录

壹. 牌坊与徽州文化·····	253
贰. 民众记忆与服饰衍化·····	277
跋·····	307

急进篇

壹. 地方督抚与晚清政局^①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历来是影响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这种内部的斗争往往会危及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甚至会造成他们内部的严重分裂。

晚清的历史也是这样。御史赵炳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那种“大臣争权,小臣附势,人心险诈,朝纲废弛”^②的现象如果继续下去,就很可能重演唐末藩乱的悲剧。

迟至清末,尽管赵炳麟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天下知大臣不知天子”、地方督抚拥权自重的状况却相当严重。这种状况加速了清王朝的最后灭亡。本文试图通过对甲午战争以后 17 年间地方与中央矛盾、斗争的初步考察,说明地方督抚在晚清政局中的作用。

① 这是 1984 年底通过答辩、由我的恩师龚书铎先生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中华书局的李佩先生,委员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守常先生和方攸翰先生。在座的还有历史系的不少师生。记得我如“初生的牛犊”,毫无怯场之意。居然对先生们提出的问题“滔滔”以对……以致一个硕士生的答辩竟用去整整一个上午!至今想来不免汗颜。毕业后这一论文曾经有几次机会在名刊上付诸发表,但因必须做相应的删节,我均未应。现在将它基本维持原样——只是修订了部分明显的打字错误(当然也是为了照顾当时的智慧和水平),收入本书,算作考察晚清历史“急进”的一个方面。

② 赵炳麟:《请销党见疏》,《赵柏严集·谏院奏事录》卷 2,民国十一年全州赵氏铅印本。

一、地方与中央矛盾、斗争的基本发展线索

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的 17 年,是清王朝从急剧衰落走向最后灭亡的 17 年。在这 17 年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社会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不断高涨。在这种局势下,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感到不能照旧不变地进行统治了,他们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伴随着这一变化,不但社会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更加激化,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尖锐起来。在这里,我将考察的重点置于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总体来说,晚清地方与中央的斗争显现出这样一种状况:当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时候,地方与中央的斗争表现得比较隐晦;而当社会主要矛盾相对缓和的时候,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就尖锐起来,斗争也就日趋频繁和激烈。当然,一旦地方与中央的利害冲突达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他们的矛盾就会跟着社会矛盾一道总爆发,使政局更加复杂化。从态势上看,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对策是“排斥”大于“扶植”,地方对中央的态度则是游离大于依附。

对这 17 年的历史做一个纵向的考察,可以发现这时期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成三个阶段:

1. 地方督抚对中央政策的消极反应:从静观不合作到公开反对。这一阶段从甲午战争后到慈禧宣布施行新政之前(1895 年至 1901 年 1 月)。

由于太平天国以后汉族地主势力的继续膨胀和发展,形成了

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严重局面。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出于统一财权以挽救经济危机,统一军政以强化统治的需要而改变了传统的扶植政策。这一变化破坏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导致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急剧恶化。

这种恶化突出地反映在甲午战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上。本来,地方督抚是中央治理地方的权力代表,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是督抚们的首要任务。然而,随着地方势力的逐步扩大,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往往要从属于地方的实际利益。这种情况在甲午以前还不十分明显,甲午以后就不一样了。除去清政府为了转嫁危机而引起了督抚们在财政问题上的不满外,还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矛盾分歧。

从中央政策来看,甲午以后具有变化大、不稳定的特点。尤其是戊戌、己亥、庚子(1898—1900)这几年,其变化的幅度有时竟大到令人无以适从。如:戊戌年间行之又废的新政、慈禧对光绪及维新派的先纵后擒、义和团时期对列强态度的急遽变化、对顽固派的重用以及洋务派在政治上的失势与东山再起,等等。政策上的急剧变化,一方面说明了中央为维持统治而选择出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督抚们“静”以观变的机会,当他们的实际利益与中央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不合作,甚至是公开反对的态度。

静观不合作是督抚们对中央不满的一种典型反应。戊戌维新中有相当一部分督抚是这样做的。

维新变法开始不久,刘坤一就写信给冯莘垞,对变法表示不感兴趣。^①当时的名流王闿运曾经把几位主要的督抚做了简单的归

① 参见刘坤一:《复冯莘垞》,《刘坤一遗集·书牍》卷1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2229页。

类，他写道：“疆臣观望风旨者如张（之洞）、陈（宝箴）、胡（聘之）、廖（寿丰）未免轻率，而谭（锺麟）、刘（坤一）、王（文韶）、陶（模）、安静太过又成废弛。”^①王所说的“观望风旨”，指的就是张之洞以及一些洋务派督抚对维新运动的投机态度。在这部分人中，除去湖南巡抚陈宝箴在维新运动中比较积极、有所作为外，其他都属于窥测时机、见风使舵。他们结交维新派，是企图在这场运动中捞到某些好处的投机分子。关键在“安静太过”这部分人。像刘坤一，官督两江，是仅次于直隶总督的要缺；谭锺麟则位居两广，处中外交通要冲，也是晚清比较重要的督抚。他们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导向作用。鉴于这种作用，光绪对他们“不肯力行新法”十分不满，特别发布上谕斥责他们“因循玩愒”。

对光绪改革政策的这种态度，虽然很大程度上出于他们一向比较顽固保守，但我们还应看到，这里面还有他们借重自身势力，对中央的政策不予合作的另一面。

老辣的慈禧很理解这一点。她对这几位督抚甲午以后在财政问题上与中央唱对台戏的情景记忆犹新。^②因此，当戊戌政变发生的时候，不光是投机的洋务派受到慈禧的猜忌，连无动于衷的刘坤一也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上谕指出：“两江重地，该督在任有年，尤贵振刷精神，力任艰巨，方不负朝廷殷殷期望之厚意。”^③对谭锺麟的处理则更干脆，先是开缺进京陛见，然后以年老疲惫，准其开

① 王闿运：《致刘景韩七启》，《湘绮楼笈启》卷4，程氏竹醒楼藏书，光绪甲辰刻本。

② 甲午以后清政府为挽救财政崩溃而进行了一系列整顿。但这些整顿都没有得到地方的支持，反而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对。像厘金问题、光绪廿五年的整顿均如此。

③ 刘坤一：《披沥自陈吁恳开缺折》，《刘坤一遗集·奏疏》卷29，第3册，第1077页。

缺回籍。

督抚们不合作的态度,加深了慈禧的不满,而慈禧对他们的一系列打击,则又促进了地方督抚们的离异。

这种离异导致了庚子年间公然抗命现象的出现。

19世纪末叶,清政府和列强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帝国主义不但在领土、主权上加快了侵略步伐,而且通过借款、输出资本等种种经济形式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干预清政府的内政。这种状况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更使慈禧不安的是,戊戌、己亥年间,帝国主义对维新党人以及光绪皇帝暗示青睐、庇护康梁远颺海外、反对废立……,再加上“归政”的传言,致使慈禧对列强又怕又恨。这种心理既是她最终妥协投降的思想基础,又是她与列强发生冲突的原因。基于此,清政府利用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让我们再看看督抚的情况。

从戊戌政变慈禧给予督抚们一个普遍打击后,在第二年(1899年)又以财政整顿为名对扼守江南财赋要冲的几位督抚进行了清算。从他们手中拿走了一千万两白银以及这部分白银的征收权。因此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督抚们与中央唱反调、搞东南互保就很自然了。当然,仅有19世纪末叶慈禧的一系列排斥政策还不足以说明南方督抚们与中央的纷争,还需要看看督抚与列强、与义和团的关系。甲午以后,李鸿章等人执意联俄,而东南几位督抚又与英、日打得火热(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特别是英帝国主义据守长江流域,这里督抚们的向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张之洞、刘坤一着意进行拉拢。地方督抚们自然也借列强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因此,保住东南一带的统治秩序,成

了督抚与列强的共同利益和要求，这种一致构成了他们勾结的政治经济基础。

让我们看看义和团运动对督抚们的影响。

19 世纪 60—70 年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南方经济重获发展。然而，南方下层民众的斗争、民间秘密组织却一时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义和团在南方没有北方那样雄厚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况对南方督抚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换句话说，东南督抚对义和团主要还是防范。有了这些条件，中央和地方对义和团的态度就不一致了。

在北方，称义和团为“义民”，顽固派们准备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攻异端而正人心”，“仗神威而寒夷胆”。^① 在南方，督抚们视义和团为“拳匪”，一再要求清政府下令剿杀。对朝廷来讲，当时“事处万难”，实有“万不得已之苦衷”；^②而对督抚们来说则是“力争无益，乃我行我法”，^③既然无力改变“刚赵抚局”的局面，只好是“矫诏不奉”。^④

督抚们的抗命，激起了顽固派极大的愤慨。他们纷纷要求重惩东南督抚，^⑤至少是撤换他们以统一号令。^⑥ 然而顽固派们并没有这样的力量。不待事态平息，胆敢抗命的督抚们竟成了保护“江

① 柴萼：《庚辛记事》，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 1 册，第 314 页。

②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上谕，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 册，总第 4522 页。

③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 2，民国二年刊本。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 3 册，第 334 页。

⑤ 参见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北京外交史料编纂处 1933 年版；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 1 册，第 17 页。

⑥ 参见高栢：《高栢日记》，庚子记事卷 1，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62 页。